

另一種國學研究

● 段玉明



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90年代以來，國學研究在學術界熱了一陣。不過其視野所及，大致仍不出傳統印象中的幾(十)個國學名人、幾所國學名校。一批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及齊魯大學等在國學領域的重要貢獻，一直湮沒無聞。也許是教會大學的西方淵源，很多人只知它與西方文化有緣，甚至指它為西方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工具；至於

教會大學與國學研究有甚麼關係，直等於匪夷所思。其實，印象與事實常常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左」的思想熏陶下形成的印象更是如此。陶飛亞與吳梓明的新著《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就是突破這種傳統印象的束縛，在基督教大學的歷史中，向我們展示了另一方被遺忘的國學園地，為相陳已久的這類研究送來一波新的信息。

西方教會在中國辦大學的初衷，當然是為了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不過著者一開始就提醒我們不僅要看到教會辦學的動機，更要看到大學辦在中國，它的對象是有相當認知水平和選擇能力的青年，學校教育必須滿足他們求知與走向社會的要求。因此「教會大學受到兩種力量的牽引，一是西方的教會，一是中國社會。就前者而言，教會大學的資金大部分來自西方，在政策上當然要受他們的影響。就後者而言，教會大學的學生絕大多數要走向中國社會，因此它們的教育方針不能不受到中國社會的影響。中國教會大學的特殊性可以說是背靠西方而面對中國」。著者完全不同於以往用孤立的、靜止的方法考察教會大學，而明確指出了教會大學與中國社會存在着一種「互動關係」，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一定會影響到

也許是教會大學的西方淵源，很多人只知它與西方文化有緣，甚至指它為西方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工具，至於教會大學與國學研究有甚麼關係，直等於匪夷所思。陶飛亞與吳梓明的新著《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基督教大學歷史中被遺忘的信息。

教會大學不僅開展了國學研究，而且研究得相當出色，證之以胡適在1947年出任北大校長時所說：「假如國立大學不努力，在學術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幾個教會大學取而代之」，就可知教會大學國學研究的勢頭了。圖為天主教輔仁大學前任校長陳垣。



教會大學的發展。在這個線索之下，著者進而描述了20年代一浪接一浪的民族主義運動，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國民政府對教會大學的立案要求，以及北京大學學術革新帶來的競爭壓力，推動教會大學內的中西有識之士，加快了這些大學的中國化進程，使得作為中國化的標誌之一的國學教育和研究，在這些大學中迅速地提昇到重要地位。著者清楚的說明了只要這些大學辦在中國社會，重視中國歷史文化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反之，它們在中國學術文化研究中經常被忽視，倒是值得我們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有點盲目和狹隘。

教會大學不僅開展了國學研究，而且研究得相當出色，這是著者揭示出來的第二個富有新意的層面。本書不同於許多同類的研究，只是就學術論學術，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外部條件。如大學行政的支持程度、研究資源的豐匱，以及中外學術交流和學術氛圍，都決定着國學研究的進展。著

者指出燕京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輔仁陳垣、金陵陳裕光、華中韋卓民這些大學校長的重視和支持國學研究，對這些學校學術事業的意義。同時又強調了哈佛—燕京學社的學術引導和霍爾(Charles M. Hall)遺產的經濟資助，也持久地推動了這些大學國學教學和研究的發展。中國學者過去常常諱言經濟待遇對學人的吸引力，但著者則明確指出了這些大學提供了穩定的薪酬福利及自由的學術氣氛，使得相當多的、甚至一些大師級的學者與教會大學的國學教研結緣甚深，貢獻良多。歸根到柢，學術成果是最有說服力的。著者除了重點分析了陳垣、顧頡剛、洪業等先生的學術活動外，還在附錄中列出了《燕京學報》、《輔仁學誌》及《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等三種教會大學主要學報的目錄，這些學報的連續性在當時是無出其右者。僅僅瀏覽這些目錄，再證之以胡適在1947年出任北大校長時所說：「假如國立大學不努力，在學術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

幾個教會大學取而代之」，就可知當年教會大學國學研究的勢頭了。

不僅如此，著者對教會大學學術傾向的分析着墨不多卻發人深思。自然，學術傾向與學者個人志趣有關，著者就曾分析顧頡剛先生的經世致用與洪業先生純學術的風格異同。但著者大致歸納了三個特點：一是在理論和方法上乾嘉學派的舊考據和英美實證主義研究佔絕對主導地位；二是在具體選題上以微觀專題為主；三則是純學術傾向。著者認為這些大學「除了研究還是研究，既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教會」，這就是所謂的「為學術而學術，學術對政治的相對獨立性」。著者指出雖然一些教師學者在抗日救國活動中相當活躍，但他們的學術主要集中在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有一定距離，因此而受到時人和後人的批評。但是著者認為「教會大學中一些有影響的學者力求做到學術要『求真』，而不強調現實的社會功能。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學術過份依附於政治，過於強調『通經致用』的學術實用主義，缺乏獨立的科學精神的一種逆反行動，是希望學術按其自身規律獨立發展」。同時，正是這種超脫感，才使得許多當時的研究有了超越時代的、比較長遠的學術價值。其實，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在中國學術界是個意義常新的老問題，也許學者們永遠是見仁見智，但著者提供的歷史反觀，也算是一種啟迪。

著者對教會大學國學研究的觀察止於50年代，在當時中美交惡的氣氛下，教會大學一朝解體，其學術研究也隨之被批為封建性、買辦

性和反動性，雖然這種批判不只是針對教會大學，但教會大學被否定得最為徹底。著者指出，在其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大部分學者都諱言自己在教會大學工作的經歷，教會大學國學研究的歷史也隨之沉寂。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教會大學因民族主義運動刺激而開展國學研究，隨着中國革命的勝利而遭唾棄，直到改革開放後才被再認識。著者描述了這種歷史的否定之否定，已經跨出了教會大學學術史的邊界，但卻值得識者深思。

近年來，出了好幾部研究教會大學的著作，改變了這一領域只有美國學者一種聲音的局面，但是把有西方背景的教會大學與中國主流學術這兩個從不沾邊的主題聯繫起來考察，則海內外僅此一部。這確實反映了著者在學術上的一種敏銳，值得有興趣者撥冗一讀。當然，這種研究還是處在初始階段，作為專題研究，範圍還可以限定得更小一些，倘若以一兩所大學作重點剖析，或能更清晰地透視問題。同時，最應該指出的是理論上進一步深入的必要。著者接觸到了中外文化交往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即如何看待「文化侵略」這個概念。事實上，學術界在分析和評價西方在華文化活動時，一直糾纏在這個政治斷語上。著者認為這個口號本身首先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應該探討它的歷史內容和歷史意義。分析的路子是對的，著者對此似乎也有些新的看法，但卻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提出了問題，留下的還是問題，無論如何，在讀者來看頗感遺憾。

近年來，出了好幾部研究教會大學的著作，改變了這一領域只有美國學者一種聲音的局面，但是把有西方背景的教會大學與中國主流學術這兩個從不沾邊的主題聯繫起來考察，則海內外僅此一部。這確實反映了著者在學術上的一種敏銳。